



惜古拂尘录

姚伯岳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惜古拂尘录

姚伯岳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惜古拂尘录 / 姚伯岳著. — 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6

(“公书林”学术丛书)

ISBN 978-7-5013-6726-9

I. ①惜… II. ①姚… III. ①版本目录学—中国—文集 ②古籍—编目
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 G256.1-53 ② G254.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1933 号

书 名 惜古拂尘录
著 者 姚伯岳 著
责任编辑 邓咏秋
封面设计 翁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100034)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010-66114536 63802249 nlcpress@nlc.cn (邮购)

网 址 <http://www.nlcpress.com>

排 版 九章文化

印 装 北京金康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6726-9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 (010-66126156) 联系调换。

“公书林”学术丛书出版说明

图书情报档案学图书是我社主要出版方向之一。为了促进图书情报档案学的繁荣发展、展现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我们策划了“公书林”学术丛书，专门收录我国图书情报档案学学人优秀著作，自 2019 年起陆续出版，以期逐渐形成规模，成为本社和专业领域的精品系列丛书。

“公书林”典出 1910 年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在武昌创办的文华公书林。以“公书林”为丛书名，既传递了图书情报档案事业立足于文献资源，无私、开放地为社会提供信息知识服务的理念，也表达了我们继承学术传统、守正开新的学术立场。尽管时代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开放”“化私为公”“共享”等精神是永恒的。

希望借着这个有历史感的文化符号，表达我们襄助图书情报档案学专业学人深耕学术、多出佳作的心愿，争取能在学术史上留下我们这代人应有的足迹，无愧于时代。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年 5 月

序 一

沈 津

姚伯岳兄的大作《惜古拂尘录》即将出版，真是令人高兴之事。这是继其《黄丕烈评传》《中国图书版本学》《燕北书城困学集》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书名“惜古拂尘”，乍一看颇有道家的韵味，但做过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人都知道，古籍被尘封土埋，那是司空见惯的。伯岳兄做了二十多年的古籍编目工作，不知为多少古籍掸土去尘，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若没有对古籍深深的眷恋，是不大容易坚持下来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惜古拂尘”，或许就是伯岳兄命中注定的机缘；也正因为他对古籍的挚爱，才有了这部书中的这些文字。

回忆第一次和伯岳兄见面，他就将刚刚出版的大作《中国图书版本学》送给我。他告诉我，这是他在离开北京赴美前的两天在出版社取到的样书，一共才拿到三本。看来这墨香犹存的新作，我算是先睹为快的第一读者了。

我在图书馆里工作，接触到的各种新旧图书多得不计其数，至于善本书库，每日必进数次至十数次，但是要去专心读一本书，却是没有闲工夫。然而伯岳兄的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稿，我却是要读的。他看得起我，还要我为他的大作撰序，我不敢作序，但我愿意将我的读后感写出来供伯岳兄参考。

中国历代藏书家很多，仅以清代至现代来说，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就著录了 1500 余人，然细细读来，对后代有大影响并值得研究者并不多。除去清末的丁氏八千卷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诒宋楼、杨氏海源阁四大藏书家外，我以为乾嘉时代的吴騫、鲍廷博、黄丕烈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藏书之举，必逢升平之

世、文富之家，方可得遂其盛，其聚书之苦辛、庋藏之慎谨，实有难以言之者也。

譬如黄丕烈，表面上看，他只不过是位鸿儒，时人及后人称之为“书痴”“书淫”“书虫”“书魔”，被誉为藏书界的“五百年来第一人”。黄丕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平常的人物，既没有登过什么高官显位，也没有创下轰轰烈烈的伟业，他的一生只是平平静静地藏书、鉴书、校书、刻书、为书编目、题跋。但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够名噪一时，在藏书界广泛传扬，甚至在其逝后近二百年的今天，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说明此人确有其非同寻常之处。

也正因为黄氏在古书收藏、研究、传播上的贡献，他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据我所知，这几十年来，港台地区的学者以黄丕烈为题所做的研究，较重要者有1962年香港学者罗炳绵的论文《黄丕烈研究》，1978年台北出版的封思毅的《士礼居黄氏学》，1994年台湾大学赵飞鹏的博士论文《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笺证及相关问题研究》。至于其他论文及文章约有二十余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黄丕烈做出了诠释。而在内地，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多为辑录出版的黄氏题跋。

黄丕烈是书林中之识途老马、芝林玉树，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对其并无专门之研究，但我对黄氏的八百多篇“黄跋”有极大的兴趣。黄的题跋曾被后来的学者多方搜集，编辑成为《藏书题识》数种，涉及古书的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我喜欢读黄跋，就在于其中所述书之源流及书林掌故，尤其是在不经意的记载中，透析出当年书之递藏、书价、学人藏家之交往，这不仅被今天的研究者所认识，也丰富了书志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的内容。近代学者缪荃孙对黄氏的题跋评价云：“于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弊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非《敏求记》空发议论可比。”这段评价是极为允当的。

有道是知音难觅，而伯岳兄实在是黄丕烈的知音。早在三十年前，伯岳兄的硕士论文就是《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而二十年前的1998年，他的《黄丕烈评传》面世，这或许是国内第一本专研黄氏的专著，从质量上看，也是一部言之有物的著作。我相信这与伯岳兄自1984年以来接触古籍整理有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又是和黄丕烈一生为

之献身的古籍收藏，内容性质大致相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对黄丕烈充满了一种既景仰又亲切的感情。”可以设想的是，如若没有“景仰”，没有“感情”，又怎么能写出《评传》？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当年我在写《翁方纲年谱》和《顾廷龙年谱》时，花费了许多精力，前者从收集资料到整理出版，先后费时四十五年之久；后者历时一年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都倾注于此。我曾说：“这本年谱（《顾廷龙年谱》）或许是我一生中写作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它和我写的其他几本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本书是带着我对先师的感情去写的。”所以黄丕烈九泉之下，如有所知，当必引伯岳兄为知己，并额手称谢。

王重民先生是一位很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家，对于这位前辈，我是非常崇敬的，这倒并非他是先师顾廷龙先生的朋友，而是在于他对敦煌学、太平天国文献、版本目录学的贡献。我在撰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时，经常要参考王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王先生应该是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美国访书的为数极少的中国学者之一，他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当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藏的中文古籍善本，而且都写成了书录。

自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私家藏书楼凡有规模者多撰有藏书志，或本人撰写，或聘请学者为之。但自有图书馆始，却没有图书馆内的专家或学者专门就馆藏善本撰为书录的。因此王先生不仅为海外尤其是在欧美地区的两个重要藏馆做了善本记录，而且我们可以认为，海外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录的有系统撰写，发端于王先生，王先生开了个好头。伯岳兄有关王先生的几篇考证文章，写得很有趣，他就所得史料信件娓娓道来，引人细思。尤其是《王重民 1941 年秘密返国史事钩沉》，将王先生的几件重要史实从小处入手，并就细节作了详细分析，有理有据，使王先生的形象更为清楚地挺立在读者面前。我们读这样的文章丝毫不会有厌倦之感。

美国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数量及质量都不容小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至现在，我去过美国不少图书馆，甚至或短期或长期曾在一些重要图书馆工作过，但所见并非全部，尤其是美国西部的东亚馆，我仅能从简单的书目中略知一二。至于国内社科领域中的一些访问学者，近二十年来访美人数骤增，但他们所利用的图书馆只是东亚馆中的极少数，且局限性很大，更不要说是一馆之藏能

了然于胸了。重要的著名东亚馆也仅有善本古籍被不断揭示，而一些小馆甚至不为国内同人所认知。

伯岳兄曾在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图书馆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将两个馆的古籍以及金石拓片、舆图悉数做了整理，并完成了工作报告。这不仅为国内的出版单位了解华大及加拿大 UBC 藏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而且使一些研究者得其门而入。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了十八年，深知要了解并解剖分析馆藏之不易，要想了解西方的图书馆所藏中文典籍，必须要有像伯岳兄这样的专才，可惜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一些大的重要的图书馆多有累年积存之未曾编目的线装古书，北大图书馆也不例外，一百五十万册的古籍几乎要接近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了，当然，这个数字中还有四十万册左右需要编目。大有大的难处，要弄清家底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有的大馆编目人员长年累月地在努力为未整理之书编目入藏。伯岳兄是古籍编目总校，这项工作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他不是理论上的什么家，他要为多位同仁所编之书把关，这就要求他的工作能力必须能够去发现问题，这也决定了北大馆古籍编目的质量。

2004 年 12 月，伯岳兄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为期一年，为该馆整理日本人堀越喜博“堀越文库”所藏碑帖拓片。应该说，伯岳兄于“哈佛燕京”是有贡献的。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一般都不坐班，可在宿舍也可在办公室做自己的课题研究，基本上活动自由，没有杂七杂八的琐事去烦扰你，也没有人管着你，你只要在一年时间结束时，将你的学术报告交出来即可。但伯岳兄就没有这么自由了，他每天要到“哈佛燕京”上下班。堀越文库所藏图书万余册、金石拓片八百多种以及艺术品百余种是 1945 年捐献给“哈佛燕京”的，但存放了六十年，一直没有人去整理，直至伯岳兄的驾临，才了解了这批文献的数量、质量和价值。如今，要想了解“哈佛燕京”所藏金石拓片，那就必须参阅他所写的《拂去历史的尘埃——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综述》。

在中国图书馆领域中的版本目录学界，真正的有实践经验的版本学家是很少

的，高手更是难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成名者，也仅有北京的赵万里、王重民，上海的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浙江杭州的毛春翔、夏定楫，山东的王献唐，仅此而已。他们长期在图书馆一线工作，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造就了他们扎实的专业水平，这种丰富的编目、整理、鉴定实践，也就显得愈加珍贵。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名者仅有冀淑英一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曾和浙江图书馆邱力成副馆长专门聊过一次关于培养古籍整理及版本鉴定专业人员的事。我当时说的三点是从我自己走过的路来总结的。分别是：第一是自己主观上想学，而领导也蓄意培养；第二是要有好的导师，最好是一流的专家，他们的实践经验丰富，可以从各方面去指导你；第三是要有大量的善本书、普通线装书以及工具书、参考书可以看、查，而且要不断地总结。三条缺一不可。这些年来，在国内几乎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师承”，所谓的“专家”也多是自学努力而成，直至今天，国内的古籍版本鉴定都没有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今后三十年内也不会出现像徐森玉、顾廷龙、赵万里、潘景郑这样的大家了，包括他们的道德文章。

这个圈子本来就很很小，要产生版本学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大量的业务实践，像黄裳、黄永年、王贵忱、韦力等都是在实践中去获得真知。伯岳兄是近年来崛起的为数极少的版本目录学家之一。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北大馆古籍资源丰厚，宋元秘槧、明清雕本、名稿精钞，应有尽有，那是几代人为之搜集而成规模的。伯岳兄在图书馆近水楼台先得月，又时时请教有经验的前辈，通过他自身的努力，勤看多查，版本实践不断增多，因某种机缘可以随时调阅比对，以增加实践和知识之积累。我相信，他写的《古籍版本鉴别和著录中的内封、牌记依据问题》《活字本鉴别与著录的几个问题及思考》《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广州刻书的版本著录问题》等文，就是以他的实践并借助于丰富的馆藏而得出的真知。

版本鉴定，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有关版本鉴定的专书，除少数的一二本外，其他的多为唬人之作。有的图书馆里的古籍“专家”谈起版本来多是人云亦云，很少实践，而堕落到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文字的人中居然也有些是有脸面的人物。不可否认的是，在版本鉴定中时常

会遇到一些复杂的特殊情况和事例，如鉴定者的眼光一般，必定一晃而过，但若有心，则疑难杂症有时也会迎刃而解，就似翻刻本或书贾作伪等，只要细查，迷惑也会逐步变得清晰，版本的真相当能得以揭示。我是赞同伯岳兄的一些做法的，文章必须从小处入手，以小见大，发人之未说，且有见地，虽不敢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却是有血有肉，让读者包括研究者感到文中没有大道理，没有冗繁的文字，耐看、爱看。

北大馆的中文古籍善本的收藏，其数量和质量，在国内的大学馆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些资源的整理和揭示或许还要等若干年后才能陆续完成。就以撰写馆藏善本书志来说，自1900年庚子事变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一直到今天的北大馆，一百多年来，都没有一本像样的善本书志，或提要，或书录，王重民先生当年曾写过一些，但在内容的揭示上略显单薄，多为卡片的放大。伯岳兄也曾写过数十篇，虽然没有收入此书，但或许也可看作为北大馆写作善本书志的先声。

近些年来，伯岳兄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文章，而这本书中的不少大作都是我喜欢读的，因为独具匠心，启我新知。有些题目是前人没有想到的，当然也就无人去查核材料认真探究了。由此，我的感觉是，伯岳兄有自信，在这个领域里脚踏实地，不断实践，时时挑战自我，终于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当然我也是很钦佩他的工作能力，在北大馆工作的几年中，他费力并思考最多的应该是“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的规划和设计，这发轫于2000年“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的建设，于是年9月筹备，至2003年底初步建成。如今有“秘籍琳琅”“学苑汲古”这样的网络化古籍书目数据库，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提供服务，其嘉惠于学林多多，伯岳兄之功不可没也。

如今伯岳兄在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获得新职，虽重担在肩，实际上也是如鱼得水，这也要感谢天津师大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让他放开手脚，运用他的聪明才智，为培养、训练中国古籍保护以及整理、编目、鉴定的专业人才多做贡献，我也期望他能够不负各方众望，做出新的成绩。

对于伯岳兄，我个人是感铭斯切的。2005年春夏之际，津患重症，幸天意垂怜，得有更生之庆。那个时候的我，手术之后，全身乏力，寝寐难安，伯岳兄则每隔三五天来看我，并带来各处寄来的书信等物件，其时又恰遇出版社发来《中

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等三本书之校样，在急难之中，是伯岳兄助余一臂之力，他费半月之功，将《书录》中的集部全部讎竣，这是我特别感激于他的。借此机会，我要郑重地对伯岳兄说一声：谢谢！

2018年8月8日

写于美国波士顿之慕维居

序 二

韦 力

《惜古拂尘录》乃姚伯岳先生近年所写关于文献学方面文章的结集，大致可分为四卷：第一卷是关于藏书家的生平及史实钩沉，第二卷是对藏书楼及图书馆源头的考证，第三卷为版本鉴定中的新发现，第四卷则是对古籍传承的理念认知。我当然知道在这四卷中，最后一卷更能代表作者的学养，但我个人对前三卷更有兴趣，这源于我关注点的狭窄，以及跟作者的交往细节。

本书作者姚伯岳先生乃是当今国内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长期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约二十年前，经过徐雁先生介绍我得以结识姚先生，那时我刚刚买到他的大作《黄丕烈评传》。因为爱好藏书，我对黄丕烈有着天然的崇拜，因此姚先生的这部大作令我得到了不少的收获，虽然现代版本目录学家有人对黄丕烈的学问不以为然，认为黄的书跋不过是把一些拉杂闲话融入其中，对版本目录学并无实质上的贡献。但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一个人的历史价值，并不单纯要关注他在学术上是否有所发明，同时也要看他后世社会风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等，将黄丕烈放在第四等，称黄为赏鉴家。洪亮吉为何有此区分？后世有着不同的解读，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应当是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言：“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按其所述，专家高于博雅，想来洪亮吉将黄丕烈视为赏鉴派当有这方面的考量，毕竟藏书涉及历史典籍的方方面面，更偏重于博而轻于专。但正是因为如此，若无广博的知识，则难以应对历史典籍的浩瀚以及不同门类典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站在

这个角度来谈，黄丕烈的重要性以及学术贡献，正体现在博雅上。如此说来，洪亮吉将其归为赏鉴派，倒是一句中肯的评价。只是如何看待博雅，倒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我在《黄丕烈评传》中果真读到了姚先生对黄的公允评价：“古今藏书家大多是刻苦治学的学者、擅长于整理图书的目录学家、校勘家或热心于刻印图书的出版家，但一般也只是偏重于其中的一二种。而同时做到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者，则首推黄丕烈；经他所藏、所鉴、所校、所刻之书，更是身价百倍，被人珍若拱璧。”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见识，虽然那时我与姚先生还未曾谋面，但心中已将其引为知己。

我与姚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那时他正为其所在之北大图书馆所藏古籍中未整理部分进行编目，但我们的话题却围绕着黄丕烈而展开。姚先生是位严谨的学者，但也有着自己的个性，面对别人给予黄丕烈的不公正评价，颇带情绪地予以反驳，这种谈话方式带给我很深的感染力。如今细读他的这部书稿，他将对于黄丕烈的研究之文放在了本书最前面，这也足见二十年过去了，他对黄丕烈仍然情有独钟。

对于黄丕烈的研究，我已读过相应的不少著述，然而书中所收录的这篇《黄丕烈生前居所及庐墓家系略考》却让我又增加了新的认识。比如姚伯岳先生在1986年撰写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如此推算起来，姚伯岳对黄丕烈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他为什么对黄丕烈如此痴迷呢？我在该文中有了小发现，原来姚先生与黄丕烈的生年竟然正好相隔整二百年，这样的巧合不知是否是冥冥中的安排？

两年前，苏州平江华府酒店的沈春蕾总经理跟我商议，于黄丕烈生日之时可在其酒店举办晒书活动，以此来纪念这位藏书大家。该酒店的一部分原本就建造在黄丕烈故居之上，并且酒店在改造时也特意将黄丕烈的藏书楼复建了起来。沈总告诉我，藏书楼的建造乃是使用了原楼的旧料。如果纪念黄丕烈的晒书会能够在这个楼里举行，当然非常有意义。我对沈总的提议大感兴趣，可是阴错阳差，这件事至今未能办成。通过本书让我了解到，作为研究黄丕烈专家的姚伯岳恰在黄丕烈之后二百年出生，所以我想，如果在举办晒书活动时，能把姚先生请来，是何等有意义之事！

姚先生在本文中也详细考证了黄丕烈生前的居所。他从昭明巷讲起，而后提到了王洗马巷，以及黄丕烈的终老之地悬桥巷。我对古代的藏书楼有着特别的感情，近十几年来，走遍全国各地去寻访藏书楼，与黄丕烈相关的这几处旧址，我当然也都探访过。而今读到姚先生文中所写，当然感到别样的亲切。而对于黄丕烈墓的探访，我跟他同样是从江澄波老先生那里得到线索，而姚先生则根据这个线索，进一步从史料中挖掘出不为人注意的记载，这也是我未曾留意过的史实。姚先生在李根源的《吴郡西山访古记》中查得黄丕烈墓的具体位置，并且根据文中所载“乙山辛向”一句来断定黄丕烈墓处在其父墓的左侧，且墓的方位坐东朝西。而且这篇文章还对黄丕烈的子孙作了相应的查证，这也给喜爱黄丕烈之人以及后世的研究增加了不少新的线索。

王重民先生是现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后世研究者则大多关注王重民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在“文革”后期含冤自杀的悲惨历史。而姚伯岳此书中的《王重民 1941 年秘密返国史事钩沉》一文，用很长一个篇幅仔细钩沉出王重民不为人知的一段秘密经历。

1941 年，王重民受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的委派，从美国秘密返回上海，准备将藏在那里的一批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暂时运到美国妥为保存。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当时未能马上办成，但王重民的确为此付出很多辛劳。虽然此前也有学者撰文谈到过这段经历，但因为史料的缺乏，并未能对这段历史做出详尽描述。而姚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资料室所藏的一批王重民文稿时，惊喜地发现了在那个时段王重民写给夫人刘修业的十七通手札。通过对这些手札的仔细研究，他将王重民往返美国上海间的具体情况得以完整地展现。2016 年 5 月，姚先生在结束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访问学者生涯之前，曾专程飞赴首都华盛顿寻找王重民当年的住处，虽然费尽周折，但由于缺乏线索，只好无功而返。但当他翻阅这十七通手札时，却意外地从中发现了王重民在华盛顿准确的家庭住址。他通过网络地图的查勘，发现王重民当年的住所距国会图书馆仅有步行八分钟的距离，这个发现是前人从未研究提及的。

在此前的藏书文献中，我未曾听闻过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也有古籍收藏。姚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未编目古籍时，无意间发现未编书库的一个角落有一批钤

盖有“饶毓泰赠书”印章的古籍线装书。而在此前的十几年，他就从易竹贤撰写的《胡适传》中读到过1962年胡适在去世之前所说的最后一段话，而这段话恰好提到了饶毓泰。胡适骄傲于他的学生中有两位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另一位则是饶毓泰。胡适是在这年的2月24日下午五点于台湾“中研院”第五次会议举办的招待酒会上说出的这样一番话。酒会结束之时，胡适走到门口突发心脏病去世，这段话因而也广为人知。但是对于饶毓泰，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鲜有人提及他的藏书。姚先生在文中也提及他以前对饶的藏书并不了解，但是后来经过多方仔细打听，终于了解到饶毓泰去世后，藏书由其女儿捐赠的详细过程。此外，姚先生还以十分克制的笔调谈及了饶毓泰在“文革”中自杀的情由。

就馆藏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而言，北京大学图书馆可谓是中国大学中收藏古籍善本的翘楚。2012年11月，北大图书馆举办了建馆110周年的盛大庆典。为了这次庆典，该馆制作了多件纪念品，其中之一是一册复制的馆藏藏书票，我也有幸得到一册，并因此想当然地认定该馆的创建时间乃是1902年。那时的北大图书馆叫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然而京师大学堂的实际创建时间却是1898年，这两者之间相差了四年。虽然此前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过疑问，并且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讨论，可惜都未曾找到重要实物予以印证，故而没有得到北大校方的认可。然而姚伯岳在进行馆藏古籍未编书的编目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册《大学堂书目》，通过对该书目的仔细考证，最终确认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建成时间是在1898年。他将这个发现提交给馆务会，而后将此发现上报学校，结果校方很快予以批复，同意将北大图书馆的建馆时间上溯到1898年，比原来认定的建馆时间提前了四年，恢复了历史真相。

既然确认了北大图书馆的建馆时间，那么该馆建馆之初的所在之地究竟在哪里？姚先生对此问题又予以深入的研究。2017年底，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在浙江开化县举办成立三周年庆典以及开化纸学术研讨会，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岳先生，他马上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讲述他通过现存档案终于证明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座藏书楼位于原公主寝殿。他在讲述之时颇为兴奋，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供职的北大图书馆有着特别的感情。通过姚先生的研究，不仅仅将北大图书馆的历史向前

提了四年，而且还通过对史料的钩沉，最终确认了该馆的第一座馆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俄军和德军先后占据京师大学堂，对大学堂藏书楼的种种破坏行径。其爱国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姚伯岳先生令我敬佩之处，还在于他关注到一些古籍版本鉴定中习惯性地被人忽视的问题。比如古籍中的内封和牌记乃是著录版本的主要依据，而姚先生在文中通过详细地比勘、具体地梳理，而后以图片对比的方式来说明：仅通过内封和牌记来断定版本是远远不够的。几年前，我曾在姚先生的办公室与之聊天时，他在电脑上向我出示这些比勘结果，在他所展示的书影中，有几种是我从未听闻过有后翻之本者。正是他的心细如发，才发现了出原刻与翻刻之间的细微差别。比如他认为有些覆刻本会将原书的内封和牌记也刻制下来，甚至原书中的避讳字以及刻工等等也同样照刻不误，而这样的版本最具欺骗性。如果没有在不疑处生疑的心态，很难发现这些区别。古籍版本鉴定近似于一种归纳推理，必须将同一部书进行各种版本间的比勘，才能有这样的发现。可惜的是，对于藏在不同公共图书馆的古籍而言，很难将同一部书的各种版本汇在一起进行比较，而单纯通过电子文本或者书影来比较，则很难发现版本上的细微差别。虽然说，姚先生能够有这样的发现，得益于北大图书馆丰富的古籍收藏，但是如果不仔细地对这些版本进行比较，也很难从中发现翻刻本，尤其是覆刻本等后刻问题。而对于增刻本，由于书前的内封以及书内的牌记并未改换，故而如果不一页一页地对比下来，也难以发现这是增刻后的后印本。正是由于姚先生有着这样的警惕，所以即使他发现书内有一些避讳字，他也依然会仔细地比下去，由此发现内容上的不同，并以此来断定这是后印本。

关于活字本的断定，同样是版本鉴定方面长期存在争论的话题。而姚伯岳则提出：“活字本是最有可能会被用来作为覆刻的底本进行复制的。”而后他举出了下如此断语的依据。虽然说之前也有专家指出过这个问题，但那些说法都没有姚先生说得这样简洁明了。对于“外聚珍”究竟是翻刻还是覆刻的问题，姚先生也分门别类地予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在活字鉴定方面，以字与字之间笔画是否有交叉点作为判定依据这个问题，姚先生也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从而确认单纯以此作为判定依据显然有些武断。

关于近现代印刷之铅排本究竟是否应该著录为铅活字这个问题，姚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把这种排印本著录成铅活字本，而恰好这也是我的观点。因为近代中国也有用传统的方式制作成铅活字，然后以手工方式印书的问题，显然以这种方式制作的铅活字跟西方传来的现代印刷铅字排印本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笼统地把这两种印本均称为铅活字本，就无法体现出用中国传统方式制作的铅活字本的独特性与珍稀性。

在去年开化县举行的开化纸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姚先生也作了专题发言。由于时间所限，他未能将自己的论文展开论述。而今我在书稿中读到了他所写的《从开化纸说开去》，由此让我了解到，他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比如他建议编纂《中国传统纸张研究资料汇编》，如果能有这样的一部汇编面世，将为传统古纸的研究学者提供很多的便利。他还寻求编制《中国传统纸张纸谱》，而这也是我十几年前的想法。我觉得现有的纸谱大多是用照片的形式印刷在书中，读者所见其实是纸张的颜色，而对于纸张的质地却完全感受不到，因此也曾着手编一部《中国印刷用纸纸谱》，可惜这本书在编完之后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面世。当我在本书稿中看到姚先生的这个建议时，还是大感兴奋，真希望姚先生的建议能够变成现实，这将为古纸的鉴别以及古籍版本鉴定提供重要依据。

以上是我读此书而引发的一些感想，也是我从此书受益之处。我想此书的其他读者应该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吧。

2018年2月16日，时为戊戌年正月初一日